

廣西教育的初期現代化(1902—1937)

朱 宏 源

摘 要

自清末以迄抗戰，中國教育的現代化充分表現在課程、制度以及識字率上。而其內容，以西化為主。本文以廣西舉例，具體加以證明。作者亦發現：教育的現代化是條漫長路途；這個時期所能達成的祇是開頭的一小段，因此以「初期現代化」呼之。

這三十六年的現代化，又可分為三個不同的階段：

- 一、光宣之際（1902～1911）。十年之內，課程與制度全面丕變，而且培養了佔全省人口 2.5 % 的新式人才。人數雖然不多，已足以響應革命，旋轉乾坤。
- 二、民國初年（1912～1925）。十四年之中，識字率提高到 20%，制度與課程方面，跟隨北洋政府，全套仿自美國。
- 三、李、白、黃時期的前段十二年（1926～1937）。普及教育做得相當積極，識字率提昇到 50% 以上。但以尚武之風盛行，其教育方式迥異於其他階段。

本文除了介紹各式現代學校的新設，並以學生畢業人數的統計，來估算識字率的變化之外，同時也介紹課程與制度內容上的興革。其目的在針對所謂中國現代化「遲滯」的說法提出質疑與修正。就整個中國而言，廣西推行新式教育的成績並不是最好的。但是，在短短三十六年，就能有這麼多的變化，則十分難得。這段短時間內的變化，比起在此之前的三百年還要大。

當然，變化的幅度與深度都很大，不等於已經走完整條現代化的道路。這段時間的廣西教育所走出來的，是從西化的初開，到達全面西化：把當年風行於世的法西斯軍國精神，配合我國的三民主義一齊實施的階段。往後，它還有很多路要走的。

廣西教育的初期現代化(1902—1937)

朱 泐 源

前 言

一、光宣之際的廣西教育(1902~1911)

二、民初的廣西教育(1911~1925)

三、李、白、黃治下的廣西教育(1926~1937)

結 論

前 言

Evelyn Sakakida Rawski 研究清代的教育與識字率，指出一八八〇年代的識字率，男人為百分之三十至四十五，女人為百分之二至十。^①以這樣的比率與英國和日本現代化發生前的比率相較，並無太大差異。因此，她認為如果高識字率是現代化必備條件之一，則中國是具備此一條件的。^②可是，中國為何沒有像日本一樣地快速現代化呢？中國未能快速現代化，其原因為何？是一個非常複雜的問題。但識字率不高，應是其中一個重要原因。Rawski 所估計的比率，學者因此懷疑有偏高的可能。^③

識字率的高低，在計算時亦因標準的不同而有相當大的差異。本文也想從廣西這個地區，來探究同一個問題。作者認為，透過對教育的研究，更能精確掌握具體

※ 本文撰寫期間，曾蒙國家科學委員會資助，黃嘉謨、陶英惠兩位先生指正，朱麗蓉、謝婉綾小姐打字，特此一併致謝。

① Evelyn S. Rawski, *Education and Popular Literacy in Ch'ing China*, Ann Arbor, Michigan,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, 1979, p.23.

② 參見：張朋園，「勞著『清代教育及大眾識字能力』」，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，9，民國69年，頁456。

③ 同上，頁458。

的內涵。作者發現，廣西省在清末有八百萬人，其中識字者佔五十萬到八十萬人，識字率約在6%~10%。這些人中，有二十一萬接受新式教育，佔全省人口2.5%，却立即成爲推動改革與革命的尖兵。顯見廣西的教育在清末開始醞釀變數。此外，本文又發現：到了辛亥革命前後，也就是二十世紀開始的三、四十年，廣西的教育以及識字率有了高幅度的變化。本文的目的，即在透過對廣西教育變遷的瞭解，體會廣西教育在初期現代化上的成就與局限。

清廷自同治初年即在北京等地嘗試新式教育，但在廣西，同治末年（1874），舊學依然遍地，新學毫無蹤影。^④即光緒九年（1883），仍無動靜。^⑤中法戰爭廣西深受影響，中日甲午戰爭舉國震動，廣西自受波及，惟教育方面，雖早於維新時期即受康有爲影響，但似乎仍無重大變化，^⑥一直到戊戌變法失敗之後。

1899年，廣西第一所學堂成立，^⑦雖然仍舊不脫舊學傳統，不過也做了若干突破。這所「廣西體用學堂」，教學內容一改過去的純粹書院式，也加上西學課程，按內政、外交、理財、經武、考工、格致六個方面開設，可說是中西合璧。並將學校分爲「治學」與「算學」兩科，共收學生一百名，多是各縣的秀才，其中治學科六十名，算學科四十名。這些學生中，有不少人後來成爲活躍的革命分子，如馬君武、曾汝環等。（這些人後來又以自費或奉派出國的方式，親赴東西洋各國留學，成爲推動廣西現代化的主要力量。）該學堂由巡撫黃槐森創辦，唐景崧主辦堂務（總教習），陳壽瑄爲提調。^⑧三年之後，再更名爲廣西大學堂。中學堂方面，梧州開辦最先。於一八九九年創設「中西學堂」，四年後併入新設的梧州府中學堂。^⑨桂林的廣西體用學堂及梧州的中西學堂的設立，確實爲廣西教育的現代化邁出了第一步，而且也產生了若干實效。不過，基本上仍是點的突破，且僅以高層的年青學人爲對象，不夠普及。

廣西教育的大型改革，要從二十世紀初葉才開始。從此以後，整套體系全面不

④ 梧州府志（同治12年），卷6，「學校」，頁1-27。這是就官書所載而言。私塾中，或者教會所辦學校的情況或許不同，但目前仍無材料可資證明。

⑤ 寧明州志（光緒9年），卷下，「學堂」，頁91-108。

⑥ 康有爲1894年來桂講學，1896年在桂林創立聖學會，發行廣仁報，學界、政界聞而從風者頗不乏人（朱汝源，廣西的初期現代化，臺北，中研院近史所專刊稿，頁365），但未引起教育制度上的變化。

⑦ Marshall Broomhall, *The Chinese Empire; A General and Missionary Survey*, London, Morgan and Scott, 1907, p. 284.

⑧ 小宏，「廣西第一間學校」，廣西地方志通訊，創刊號，1982年10月，頁64。另見：郭廷以等，鄧家彥先生訪問紀錄，臺北，中研院近史所，民國79年，頁71。另有黃嘉謨指出，唐景崧擔任中學總教習，西學總教習爲粵人利文石。（「馬君武先生的早期著作及其思想轉變」，廣西文獻，期12，民國70年4月，頁19。）

⑨ 李彥福等編，廣西教育史料，南寧，廣西人民出版社，1990，頁149-150。

變，學人士子積極從事西化的工作，同時也保留若干傳統的成份。廣西人或放洋，或至他省留學，所學科目，泛及法律、政治、軍事、農業、醫學、理化、經濟，甚而至於體育、美術、音樂。所培養新式文生及武員，在中國近現代史上均有傑出表現，特別是武員。在這段為期不過三十餘年的時間中，其培育的方法又有多次重大的更動或突破。爰分為：清末光宣之際仿日時期、民初動亂中從仿日到仿美、以及抗戰之前法西斯化的教育三階段，來加以闡述。

一、光宣之際的廣西教育(1902-1911)

光緒二十七年(1901)五月兩江總督劉坤一、湖廣總督張之洞會奏變法事宜，清廷納其議，通令全國各省改書院為學校，省城設大學堂，府廳及直隸州設中學堂，散州及縣設小學堂。^⑩學校制度自此而興。兩年後，公佈張百熙、張之洞、榮慶所奏擬之新式學堂章程。^⑪

廣西方面，於翌年由巡撫丁振鐸加以實行，學制改革運動於焉展開。廣西近代教育改革，其幅度及廣度均深，不祇遍及初、中、高等教育，包括普通與職業教育，而且在教材、課程內容、教師、教室等軟體 (software) 與硬體 (hardware) 設備上，亦不同於往昔。以下，將依次加以介紹。

前已言及維新運動時期，廣西已在高等教育方面走出第一步。1902年開始，則進入第二個階段，前後相隔只有三年。該年由丁巡撫上奏提倡改制，將前任巡撫黃槐森奏准之體用學堂，增建為廣西大學堂。^⑫除此之外，在小學與中學方面，也有所展佈。接踵其後的，有女學、警校，以及師範、實業等學堂。

小學方面，於光緒二十八年初創。各州縣書院，開始改制，成為中西兼顧的學堂。^⑬開辦新式小學堂的縣分，為桂林、榴江、宜山、陸川以及思恩。數年之後，也就是從全面廢除科舉的光緒三十一年一直到光緒末年，全省辦有小學的縣份，已佔74%。再過三年左右更普及全省各縣。不過，當時小學僅能在各個縣的縣城內看到，而且設備簡陋，經費奇缺。其校舍無非利用廟宇神社；課業用具，除了並不合用的神桌板凳外，別無他物。在這個時期，小學與私塾，實際上並無任何分別，不

^⑩ 李國祁，中國現代化的區域研究：閩浙臺地區，1860-1916，臺北，中研院近史所，民國71年，頁480。

^⑪ 俗稱「癸卯學制」，自1903年至辛亥年，大體為全國各省所遵行。參見謝國興，中國現代化的區域研究：安徽省，1860-1937，臺北，中研院近史所，民國80年，頁530。

^⑫ 朱有鑑編，中國近代學制史料，上海，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，1986，頁461。

^⑬ 陸川縣志（民國13年），卷9，頁4。

過名義不同而已。^⑭

中學方面，雖有梧州府中學堂拔得頭籌，但全面推動之始，仍屬光緒三十一年之桂林府中學堂。其次則為平樂府官立中學堂、南寧府官立中學堂及潯郡中學堂。再次為柳州、容縣、鬱林、宜山、賓陽、崇善、梧州、武鳴、百色及平南等縣。從初創到宣統三年，七年之內，全省共有十六所中學。學堂設備亦甚簡陋，多由舊書院、考棚或廟宇修葺權充。^⑮惟普通中學教育及高等教育並非當年新政的重點。當時桂省教育的重心，除小學堂外，其為各種職業及特殊的學堂。

女學很早即受重視，光緒三十年容縣陸寵廷捐貲倡設女校，請桂林高等學堂總理之夫人等為教習，設校梧州，^⑯名曰：「珊瑚女學堂」。^⑰光緒三十四年，桂省司道准設女學師範簡易科，並附女子初等小學暨手工各一科。招考女師範生，以十六歲以上，二十五歲以下，粗通文字，不纏足者為合格。並飭近省各州縣選招申送，免收學費。^⑱又札昭平縣，令整頓學堂，籌助女學經費。明言：「女子為國民之母，女學為家庭教育之本根」。^⑲當年即收有女學生三十八名，教授國文、修身、算學、女紅四門。^⑳

警察學堂早於光緒三十年即已設立。由按察使王芝祥創辦，附屬警察總局，分為永久、速成兩科。^㉑後來又設高等警察學堂，其學生以本省舉貢生員及曾在中學堂以上畢業者考選之，同時限定外省學生名額不得超過本省學生十分之二。^㉒宣統元年，設監獄學堂，六個月畢業。

軍事學校方面，光緒三十一年，於桂林開辦隨營速成學堂，於南寧設講武堂，龍州設將弁學堂。三十二年，開辦陸軍測繪學堂。三十三年於桂林設陸軍小學堂。俟宣統元年，省垣成立混成協之後，開辦幹部學堂。^㉓

師範講習社於光緒三十一年次第開設。^㉔隔年於鎮安府極邊地區創學務公所，附以速成師範傳習所。^㉕俟師範生畢業，再以其充作該地兩等小學堂、土司學堂、

^⑭ 第一次中國教育年鑑，丙：(-)，教育部編，民國23年；臺北，宗青出版社，民國72年景印，頁454。

^⑮ 同上，頁241。

^⑯ 東方雜誌，1:5，光緒30年6月25日，教育，頁124。

^⑰ 同上，2:11，光緒31年11月25日，教育，頁294。

^⑱ 同上，5:1，光緒34年1月25日，教育，頁41。

^⑲ 政治官報，號132，光緒34年2月10日，頁13-14。

^⑳ 容縣亦於光緒31年設有「龍騰女學堂」。東方雜誌，2:9，頁246。

^㉑ 東方雜誌，2:15，光緒31年12月25日，教育，頁347-348。

^㉒ 「資政院奏核議廣西高等警察學堂招生辦法請旨裁奪摺」，順天時報，宣統2年11月1日。

^㉓ 東方雜誌，2:3，光緒31年3月25日，教育，頁51。

^㉔ 同上，3:12，光緒32年11月25日，教育，頁204。

^㉕ 同上，4:9，光緒33年9月25日，教育，頁228。

蒙學堂的教員。光緒三十三年，桂林設初級師範學堂，招考學生五百人。除由簡易師範四班學生中挑選外，不敷之額分別向外招考，^{②⑥}以便造就小學教員。^{②⑦}三十四年復籌辦優級師範，^{②⑧}九月開學。六月間張鳴岐奏請於南寧府設立完全初級師範學堂，以訓練左右江邊關學生，畢業後派赴各屬，充當校長、教員，同時調用舉人陸爾奎（江蘇人）、候補知縣況仕任擔任教職。^{②⑨}宣統三年，廣西優級師範選科首屆畢業生，其中史地科優等六名、中等四十一名；理化科優等五名，中等三十一名；博物科優等十三名、中等三十二名；數學優等七名，中等四十一名，均受命派充中學堂及相當程度各項學堂副教員，或高等小學以下各項學堂正教員。俟義務年滿，作為師範科舉人給獎。^{③①}而初級師範簡易科之畢業生，最優等者作為師範科貢生，以訓導用，令充小學堂之正教員；優等者亦作為貢生，以訓導銜，令充小學堂之副教員；中等者，不給獎勵，但充小學堂之副教員。^{③②}

實業學堂亦為重點。光緒三十一年梧州知府擬設農業學堂。^{③③}翌年該地士紳開設商業學堂、^{③④}蠶桑學堂。^{③⑤}原已開辦之農林試驗場，於宣統元年改辦中等農業學堂。先設豫科，並從德國選聘教習。中等農業學生畢業後，以直州判、府經歷等予以獎勵，並派令專用為「勸業員」。^{③⑥}總計宣統元年廣西省實業學堂，中等者有三所，學生四百一十人；初等者乙所，學生四十九人；實業預科三所，學生一百三十二人；合計七所，學生五百九十一人。^{③⑦}

除了以上各式學堂之外，另有法政學堂、^{③⑧}土司學堂等等，^{③⑨}均於光緒末年、宣統初年興於桂省。各式各樣的學堂，其成立的背後，靠的是人與錢，在人才與經費均嚴重缺乏的情況下，桂省官員可謂竭盡所能，挖空心思，希望短時間內就能把

②⑥ 順天時報，光緒34年4月15日。

②⑦ 學部官報，93，宣統1年5月9日，頁1a-2a。

②⑧ 政治官報，號252，光緒34年6月12日，頁5-6。況氏為康有為於1894年來桂講習時的門生，深受西學影響。

②⑨ 同上，號1203，宣統3年2月9日，頁4-5。

③① 同上，號1324，宣統3年6月13日，頁3-4。

③② 東方雜誌，2:9，光緒31年9月28日，頁245-246。

③③ 同上，3:6，光緒32年5月25日，頁138。

③④ 同上，3:13，光緒32年12月25日，頁41。

③⑤ 政治官報，號460，宣統元年1月20日，頁12。

③⑥ 周談輝，中國職業教育發展史，臺北，三民，民國74年，頁49。

③⑦ 南寧講武學堂，總辦蔡鐸，光緒34年6月開辦，宣統元年2月畢業。參見：政治官報，號984，宣統2年6月20日，頁9-10。其餘各軍校，參見：李彥福等編，同前，頁155。

③⑧ 預備立憲首需培養法政人才。參見東方雜誌，3:11、4:3，及政治官報，號167，光緒34年3月16日；號977，宣統2年6月13日等有關桂省法政學堂之報導。

③⑨ 土司學堂為桂省特有之學堂，但成效不彰，於宣統2年停辦。見：政治官報，號173，光緒34年3月22日，頁18；號1131，宣統2年11月19日，頁5-6；東方雜誌，5:6，頁145；以及教育雜誌，1:2，頁10。

新式教育舉辦起來。^⑳他們的願望，自然難以立即達成。

培養中等及基礎人才，可以省內就地興學。培養高級人才，就必須求諸省外，甚至國外。留學他鄉，遂成風氣。^㉑留學返國服務者，多成爲省內的新進精英，帶領省民，參與改革，甚至革命。日本於甲午之戰、日俄戰爭中擊敗中國與俄國，遂後來居上，成爲國人仿習的對象；^㉒而仿習的科目，除了軍備，更開始重視法政。光緒三十年，練兵處奏定章程，定額選派學生留日，廣西每年三名。^㉓光緒三十一年，容縣龍膽女學堂學生陸書蕉（十八歲）、陸菱絹（十七歲）均於普通學科略有根柢，且具尚武精神，能馳馬放槍，亦結伴東渡游學。^㉔翌年，省方特派學生十二名學農工各科，四名專習警察。^㉕其他自費赴日者亦不在少。總計光緒三十四年至宣統元年間，桂省留日學生登記有案者，即有六十名左右。^㉖實際人數恐怕還要超出甚多。這些留日學生，親眼看到日本的富強，自思效法，對祖國改革的要求也因此大增，於是行諸文字，在東京創社，於1907年7月，發行報刊，名曰「粵西」。^㉗在此之前(1905)，更有留日桂生馬和（君武）、鄧家彥等多人，加入同盟會，成爲抗清的重要成員。桂省所培養的人材，有許多於學成後返鄉效勞，其中許多人同時加入革命黨，在南寧、桂林、梧州等地形成力量，創辦「南報」、「南風報」鼓吹改革甚至革命，^㉘對抗統治當局。^㉙顯然，新式教育所培養的優秀人才，逐漸形成新的文化力量，對維護現狀的政治力量，開始產生掣肘，甚至挑戰的功效。

留日之外，桂省亦遣多人留學歐美。光緒三十四年有八人赴美(包括鄧家彥)，習農、礦、鐵道、銀行等科；有六名留法，習礦冶、鐵道；一名留德(即馬君武)，習礦；還有一名留比，也習礦。^㉚這些人返國之後，都成爲文化界的主要力量，他們也參與政治事務，成爲中國近現代史上影響頗巨的一批廣西人士。^㉛

^⑳ 政治官報，號253，光緒34年6月13日，頁7-8。

^㉑ 不著撰人，近代中國留學史，南京，民國15年；臺北，中國出版社，民國62年，頁195-200。

^㉒ 黃福慶，「自序」，清末留日學生，臺北，中研院近史所，民國64年，頁2。

^㉓ 不著撰人，近代中國留學史，同上，頁58。

^㉔ 東方雜誌，2:9，光緒31年9月25日，頁248。

^㉕ 同上，3:7，光緒32年6月25日，頁179。

^㉖ 清末各省官、自費留日學生姓名表，臺北，文海，民國67年，頁2、395。

^㉗ 汪向榮，中國的近代化和日本，臺北，百川，民國77年，頁71。

^㉘ 「南報」爲同盟會刊物，宣統2年出版；被禁後改名「南風報」，宣統3年出版。

^㉙ 在梧州的劉嶠爲同盟會廣西分會主盟人，與會員蒙經、黃宏憲、蘇無涯等，更在「梧江日報」、「廣西日報」上撰文，諷評時政。另外，又組成粵劇團，到民間上演「岳飛報國仇」、「文天祥殉國」等革命劇。詳見：梁學琴、李業安，「同盟會在梧州的宣傳活動」，梧州文史資料選輯，9，1985，頁23。

^㉚ 政治官報，號253，光緒34年6月13日，頁7-8。

^㉛ 出身進士、翰林院編修，後來亦留學日本的陳樹勳亦被重用。見學部官報，99，宣統元年8月1日，頁4b-5a。

延聘日本及歐美教習，亦不失為可行方法。光緒三十二年廣西許多學堂，延請日本教習，以實習各種科學，兼尚武功。^⑤中國延聘日本教習以 1906 年（日俄戰後一年）為最多。^⑥不過囿於語言的障礙，教官授課必須透過翻譯。但翻譯並非易事，特別是專業語言。由於缺乏翻譯人才，因此收效不大。^⑦

人才培育的最根本辦法仍在自行培養，也就是教育的本土化。教育本土化的方式，主要可分為三種：首先是由他省調用人才來桂訓練新人；^⑧其次，本省人至外省求學，再返省服務；以及本省人在本地接受訓練，畢業之後再充教員，以訓練更多人才。三者之中，自以第三種最普遍。當局於光緒三十三年辦有師範學堂、師範簡易科、及師範傳習所，全省共四十一間，因此擴大招考，增加名額。同時將舊制的拔貢、優貢、生員變成一種獎勵的頭銜，授予自中等學堂畢業的學生，^⑨並即分發到各式學堂，擔任監督、正教員、副教員等職。據張鳴岐奏報，光緒三十二年所訓練畢業之學生有七千六百人，三年後各級學校應屆畢業學生，已增加到四萬零三百人。^⑩

以上，從各式學堂的成立以及人才的培養來看，依據最保守的估計，至宣統元年，廣西省已經醞育了 113,190 個新型文化人。^⑪至宣統三年，人數應可達到二十萬左右，成就堪稱可觀。不過，這些人加上祇受過傳統教育的人數，總額應在五十萬到八十萬之間，與全省八百萬的人口相比，仍屬少數。^⑫在量方面仍舊不足以主

⑤ 大公報，光緒32年6月18日(1906, 8, 7)。

⑥ 汪向榮，同前書，頁93。

⑦ 同上，頁90。

⑧ 政治官報，號1018，宣統2年7月25日，頁11-12。

⑨ 參見廣西教育研究，1942年，卷3期3，轉載於李彥福等編，廣西教育史料，頁181-186；及政治官報677，號，宣統元年8月2日，頁6-7；號832，宣統2年1月15日，頁10-13；以及內閣官報，號49，宣統3年8月20日，頁311-312；號74，宣統3年9月15日，頁289-290 有關添加拔貢名額，加倍錄取優、拔貢名額，以及中學堂優秀畢業生分別以拔貢、優貢、歲貢、優廩生名義給獎的奏摺。

⑩ 政治官報，號1018，頁11。

⑪ 宣統元年時全省新式教育人口數，係根據：呂清夷之「清末民初廣西興學紀略」一文中的「廣西興學以來歷年學校統計表」，轉載於李彥福等編，廣西教育史料，頁165。惟由於當年未曾普查，統計難以精準。

⑫ 張鳴岐稱光緒34年全省各級學校及學生數為專門學堂1所，學生346人；實業學堂7所，學生386人；師範學堂12所，學生1464；中學堂11所，學生1440人；小學堂676所，學生27,705人。合計所707，學生31,341人。較前一年481所，21,405人，前二年的145所，7,701人增加甚速。

（張鳴岐，「第二屆籌備憲政成績摺」，宣統元年9月23日，轉載於順天時報，宣統元年10月21日。如以這樣的速度增加，到宣統3年時受過新式教育一年以上者，應有20萬以上。未受新式教育，但在私塾就學一年以上者，由於缺乏統計，極難精確估計。惟猜想從1860到1910，扣除死亡人數之後，應在每年平均5千人之譜。以50年計算，舊式教育人口到宣統元年時應有25萬人。二者合計，約為50萬人。當時廣西人口將近9百萬。故而識字率應在百分之6左右。惟此項估計較保守。據英國駐龍州海關英籍助理監督J. H. Fougerat 估計，1900年時識字率應在10%左右。(Decennial Reports, Lungchow, 1892-1901, p. 440) 但他所估計的人口數較低，為600到750萬人。因此，兩種估算的實際數額相差並不算太大。

導整個的社會；在質方面，除了極少數外，大部分祇有今天小學畢業或初中畢業的程度。雖然，此種成就與舊制的廣西每年祇產生千百名略知四書五經，於西學、西政、西藝、西技毫無所知的生員相比，已有長足的進步。特別是留日返省的學生促成有關當局全力仿日的作法，已使日本的學術、日式教育制度大量輸入中國，進入桂地。

武學生方面，從振武學校返國的新軍官，在廣西講武堂，訓練出一批批新式軍官，活躍在民國的政治舞臺，對於推動廣西、廣東甚至湖南、江西、安徽等省的現代化，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。

從清廷本位來看，雖然由於積極推行新式教育而導致清帝的遜位，與帝國的瓦解，但從整個國家向前推進的大角度看，則清朝政府以西方為師的教育政策無疑得到了具體的成效。^⑤當然，這是就共和的觀念而言，其成效幾乎可以說是立竿見影。其他如實業、外國語文、數學、化學、物理等等，則較需時日，還在始動的階段，談不上具體成就。大部分人民，依然停留在不識字的狀態。

二、民初的廣西教育(1911-1925)

民國建立以後，廣西教育更進一步走向西化。其方式仍是由上而下的灌輸與推動。由於民初政局動盪，中央政府更迭頻仍，教育的方針也因而多所變異，廣西的政治情勢較中央安定，但在教育方面並無自創的見解，因此仍然跟隨中央，也有大幅度的調整。調整除了幅度大以外，所涉範圍亦廣。制度方面：舉凡學制、課程、教材所用文體、教學所用語言；行政方面：舉凡編制、人事；數量方面：各級學校的興廢；以及經費、師資等方面，都有變化。爰依序介紹，並舉南寧市和陸川縣為例，具體加以說明。

五四運動之後，留美返國學生的影響力明顯超過留日及留歐。美國的制度逐漸受到注意。自民國十一年起，「新學校系統改革令」公布，此一變革，深受美國教育學者 Paul Monroe (孟祿)、John Dewey (杜威)、W. A. Call (麥柯) 等來華的影響。從此以後，我國開始接受美國的教育思想和方法，並於當年十一月公布「六三三新學制」，也就是小學六年、初中三年、高中三年的制度。^⑥我國的學制自此逐漸遠離日本、德國的影響。

^⑤ 新式教育造就許多人才，成功地將中國的政體從帝制改為民國。

^⑥ 司琦，中國國民教育發展史，臺北，三民，民國70年，頁 207-209。

中央改採美國新制，是在民國十一年底。當時廣西兵亂連年，正值「自治軍」蜂起時期。未改新制之前，廣西的學制非常複雜，單單小學方面，就有六四制、五五制、五四制、五三制、四四制、四三制等五花八門。^{⑥1}至民國十一年底改新制之後，才逐步變成六年制小學：初級四年，高級二年，逐漸劃一，但仍與公布的六三三制不同。

課程也有不少變更。在民元以前，小學課程為：修身、讀經、國文、算術、格致、地理、歷史。民元之後，初等小學為：修身、讀經、國文、算術、體操；高等小學則加授地理、歷史、理科、英文（另有一些學校刪英文，而改授農業。）民國十一年改新制之後，初級課程為公民、國語、算術、衛生；高級為公民、國語、算術、衛生、物理、歷史、自然、社會。^{⑥2}

各科教材所用文字，未改新制前為文言體，改新制後為白話體。所用語言也規定統一採用「國語」而不用方言。有少數縣份因語言不同，立感國語教師缺乏的嚴重性。為求補救，乃由各縣勸學所派遣教員，到省會南寧學習國語。畢業後即回本縣，開辦國語傳習所，以普及國語的發音。^{⑥3}

以上是就制度方面而言。制度既然更張，行政組織方面也變動。在新學制未實行以前，全省小學校不論大小，其行政工作多由校長一人承擔。改制以後分工較細。「完全小學」方面，校長以下分設教務、訓育、事務、體育各部。每部各有專人負責。而一切重要事務則取決於校務會議。至於非完全小學，如有教員三人以上，亦分別委以教務、訓育、事務各部之工作。^{⑥4}分工較細固然值得鼓勵，但多數的學校均係草創，學校行政尚無成例可行，運作起來殊為不易。

政局不穩更使變動加劇，廣西在陸榮廷統治下，雖曾在民初有將近十年的安定，但是在民國十年至十一年間，又因粵桂興兵，省自治軍蜂起，以至「學款挪作軍費，校舍變為營房；加上土匪猖獗，社會秩序靡定，因此全省學校停辦幾半。^{⑥5}

人事調動亦繁，更使教育之推展雪上加霜。如平樂縣，自民元至民國十七年，短短十七年中，換了二十六個縣長，^{⑥6}平均每人任期祇有八個月。縣長更迭如此頻仍，各校人事自亦難以安定。

^{⑥1} 第一次中國教育年鑑，丙，教育概況，(-)學校教育概況，頁 455-456。

^{⑥2} 同上。

^{⑥3} 同上。

^{⑥4} 同上。

^{⑥5} 同上。

^{⑥6} 平樂縣志（民國29年），卷3，政治，頁 153-154。

還有財源短缺的困擾。梧州、桂林等城幾乎沒有一所學校沒有財政上的難題。教員待遇過低，學生無法飽食，不祇行政的推動不易，即教與學的效果亦大打折扣。加上社會動盪、人心惶惶，百業蕭條，就業機會減少。數以千計的中學生，在畢業之後，大部分無法過一個起碼的舒適生活。有些畢業生，即使在公家機關或私人商號找到事做，也發現無法施展才華。^{⑥7} 學生素質不高與社會環境混亂兩相影響，造成了惡性的循環。桂林、梧州如此，龍州亦然。新式學校逐年增加，但是並不十分穩定。例如1902年有幾間中學新設，到了隔年就又關閉。這種現象比比皆是，一旦遭遇兵災，逃難已來不及，更甯談上學，而遭受兵燹的校舍，也沒有經費修護。^{⑥8}

不過，民國元年到十年之間，並非每個地方都像上述那般混亂。這段期間，省會南寧的發展情況可圈可點。在民國五年時，小學有三十所左右，到了民國十年增加到兩百所，學生也增到一萬人。中等學校也增加。於1915年開設的廣西第三師範，到1921年有學生兩百人。1918年新開一所中學。1920年甚至還舉辦校系運動大會，男女學生都參加，非常成功。不論普通中學或者師範學校，體育課受到相當的重視。女校的成長也有目共睹。南寧的女子中學，到1921年有四百名學生。農林學校同一年創設，學生也有數百名。講武堂復於1920年設立，聘來日本教官，第一期即招收二百七十名軍官，隔年畢業。不過，在第一期學生畢業之後不久，學校又關閉了。^{⑥9}

南寧是新的省會，政府及人民的注意力都集中於此，自然經費充裕，辦起來有聲有色。其他地區，就不若南寧幸運。桂林、梧州、龍州三大城鎮以及平樂的狀況就不相同。其他地區，情況也不甚佳。

陸川縣可以為證。清末為響應新政，陸川的西式學堂一下子成立了二十四所；但不數年其中十八所即又關閉。到了民國初年，其中祇有七所重新規復，中間荒廢的時間不可謂不長。^{⑦0} 從陸川的遭際（參見表一），可以看到民初教育工作的困難。

從表一陸川一縣自1904至1923新式學校興廢的簡單統計，亦可管窺清末民初二十年廣西省人才培育的情形，其中包含若干起伏。大致上說，光緒三十二及三十三

^{⑥7} Decennial Reports, 1912-1921, Wuchow, p. 292.

^{⑥8} Ibid, Lungchow, p. 348.

^{⑥9} Ibid, Nanning, p. 305.

^{⑦0} 陸川縣志，卷10，頁2-6。

表一：清末民初陸川縣新式學校興廢簡表 (1904~1923) 單位：所

時 間	新 設 校 數				關 閉 校 數			
	高 小	兩 等 小 學	中 學	合 計	高 小	兩 等 小 學	中 學	合 計
光緒30(1904)			1	1				0
光緒31(1905)				0				0
光緒32(1906)	5	5	1	11		2		2
光緒33(1907)	7			7	2	1	1	4
光緒34(1908)	1	4		5				0
宣統 1(1909)				0	1			1
宣統 2(1910)				0	1			1
宣統 3(1911)				0	6	4		10
	小 學	國 民 學 校	中 學	合 計	小 學	國 民 學 校	中 學	合 計
民國 1(1912)				0	1			1
民國 2(1913)			1	1	1			1
民國 3(1914)				0			1	1
民國 4(1915)				0				0
民國 5(1916)	3			3				0
民國 6(1917)				0				0
民國 7(1918)		10		10				0
民國 8(1919)	1	110		111				0
民國 9(1920)	1	5		6				0
民國10(1921)		6		6		4		4
民國11(1922)	1	16		17	1	8		9
民國12(1923)	1			1	1	7		8

資料來源：陸川縣志（民國十三年），卷10，頁1-25。

年，以及民國八年到十年這兩小段，似為廣西教育行政的黃金時期。①陸川縣在光緒三十二年及三十三年間（1906至1907）新式學校成立了十八所，不過也有六所立即關閉。其後從1908年到1918年，新成立的學校相當之少，祇有1908年的新設四所，其餘各年都非常冷清。1918年算是新的轉捩點。隔年則非常驚人，一年之內新

① 第一次中國教育年鑑，丙，教育概況，(-)學校教育概況，頁241。

成立的學校爲數竟高達一百一十一所。不過，到了下一個年頭（1920）又急劇縮小，有六所新校，二一年也有六所，二二年又增爲十六所。高低起伏之大，顯見不穩定的程度。祇是大體而言，仍屬樂觀，因爲新建的數量遠遠超過關閉的數量。

另外還可以看出陸川縣到了民國十二年，教育的重點在小學。中學對於當時的人而言，可以說已經是相當難得的高級學府。小學的體制也在民國七年開始又有變化：原來的「小學堂」，開始改爲「國民學校」。但是由於同時又沒有廢止或禁止小學堂的創設，結果造成傳統私塾、高等小學堂、兩等小學堂與國民學校混合並存的現象。舊習、舊制、舊學未除，新制度、新作風、新學術又已傳入，最容易看到新舊雜陳的景觀。

政治與當時的人才教育關係極密切，從陸川縣新式學校的興廢可以看得很清楚。光緒末年是推行新政最熱切的幾個年頭，而新校也競相產生。祇不過教育乃百年大業，急躁不得，急則適得其反，因此立即關閉的新式小學也不在少數。宣統年間，國運日蹙，廣西似無新設之學校。反之，關閉的學校增多了，特別是宣統三年。在辛亥這一年，及1912年，共和革命生，清室瓦解，地方政府亦在混亂當中，社會也不穩定，故有許多學校關閉。民初廣西雖有陸榮廷，但軍事重於一切，教育少人顧及，兼以經費備極短缺，^⑳因此開始的幾年新成立的學校十分之少。等陸氏掩有全桂，兼主粵東，廣西局面一片美好，學校更如雨後春筍，爭先成立。不數年，俟陸氏勢蹙，學校新建者又快速減少，關閉的學校反而增多了起來。^㉑十餘年中，興衰起落如是之速。政治因素嚴重干擾教育，亦由此可見。

中學方面起伏亦十分之大，民元以後至民十一，全省中學增加了十四所，其中兩所爲女校，連原有的十六所，共三十所。惟因粵桂軍興，經費支絀，旋復停辦六所。新學制施行之後，廣西從民十二至十五年，適逢李宗仁、黃紹竑等崛起，省局漸趨穩定，新辦中學十所，停辦而又恢復者五所，連前二十四校，共計三十九校。

㉒

其他學校命運亦厄。專門學校方面，清末廣西原有多所。民初則大量減少，僅有法政專門學校四所，但無法維持，於民國五年奉命減縮，其中兩所改爲講習科。民國六年時只剩桂林、南寧兩處。其餘如師範學校，光緒三十三年有四十一間，民

^⑳ 其經費原來已經非常之小，又被挪作其他用途，根本極難開展。

^㉑ 遷江縣的情況亦接近。詳見遷江縣志（民國24年），頁 216-221。該縣於民國9年成立了190餘所國民學校。但因基金未固、校舍未立、搬遷無定，多未獲立案，而地方款復支絀無法補助，因此一遇民10政變，多無形停頓。

^㉒ 第一次中國教育年鑑，丙，教育概況，頁 241。

初全省共三校，均屬省立，分設梧州、桂林與南寧，龍州設有師範傳習所。實業學校方面，清末至少有七所，民六時計有二所，均省立，一為甲種蠶業，設於梧州；一為甲種工業，設於桂林，內分土木、機械兩科。⁷⁵從這三類學校看來，民初的情況遠不若清末。

巧婦難為無米之炊。廣西民初教育之推展，困難固然很多，其中最重要的還是財政問題。沒有足夠的經費，任何高遠的理想都難以落實。多賀秋五郎所統計廣西省民一到民六的教育經費，各種教育項目中，每年均列有經費的竟然不到五分之一。⁷⁶猶有甚者，這些極有限的經費之中，竟然還能包括東西洋留學經費、外省留學經費、以及省立第一及第二師範、省立第一工業學校、桂林模範兩等小學、和桂林圖書館的支出。其他如高等學校、優級師範、梧州、桂林、龍州中等農業學校、南寧女子蠶業學校、南寧模範小學、桂林法文學校等等，五年之內竟然祇撥到一年或兩年的經費，而且數額非常之少。像優級師範祇在民元時撥到 6,184 元，桂林中等農校於民元得到 7,084 元，桂林小學手工教員傳習所更祇分得 1,282 元，南寧女子蠶業學校得 1,607 元，都低到無法想像。最糟的是省政府「補助各中小學校」的款項，全省一千多所學校，⁷⁷省府的補助總額，於民國元年為 13,183 元，民國二年為三位數的 240 元，接下來的四年更糟，都要各顯神通，自謀生路。經費短缺到這種地步，難怪各地不聽命於省府，各省不聽命於中央了。

經費既已短絀，為防再被地方當局挪用，教育部於民國二年十二月三日通咨各省：「教育經費不得挪作別用」。⁷⁸三年二月十日更通令各省「劃還」學務經費。明令各地民政長，將從前為舉辦自治會而挪用者，責成各縣知事，一律劃歸學務。⁷⁹二月十六日復命令各省在地方自治停辦後，「凡關教育職務，應另設學董執行。」⁸⁰惟中央號令，無法達於地方。言者縱使諄諄，聽者却是藐藐。令下之後七年，依然故我者比比皆是。除議會政治之運作能夠公開挪用教育經費外，暗地裏美其名為「軍事教育」而將款項撥歸軍事者更是所在多有。⁸¹

由於經費奇缺，如何善予分配資源以發揮最大的功能，又是另一個難題。民初

⁷⁵ 清末的資料來自李彥福等編，廣西教育史料，頁 165；民國的資料出自多賀秋五郎，近代中國教育史資料，民國編（上），臺北，文海，民國65年，頁 371-372。

⁷⁶ 多賀秋五郎，同上，頁 372-373，但是否由於資料缺如，使作者無法填上數字？仍待查。

⁷⁷ 同上，頁 372。

⁷⁸ 教育雜誌，5:9，民國2年12月10日，頁72-73。

⁷⁹ 教育雜誌，5:12，民國3年4月10日，頁 105。

⁸⁰ 同上。

⁸¹ 順天時報，民國10年6月13日。

教育的重點，似在普及基礎教育上面。因為初等小學為義務教育，以普及為要旨。在較少的經費下，不宜鋪張粉飾，而應竭力撙節。民國三年初，教育總長汪大燮通令各省，就校舍（硬體方面）、學科（硬體與軟體兩方面）採行以下方針：^②

就校舍言，或經營茅舍草房，或租賃廟宇祠社，但使灑掃整潔，斷不至有礙衛生。

就學科言，圖畫、手工、音樂等科用具用品，應力求儉約。倘經費未甚充裕，即學科亦無妨暫缺，惟修身、國文、算術、體操四科必不可少，但使教授得法，斷不至貽譏簡陋。

在硬體建設方面，儘量利用舊房舍，不另新建；在軟體建設方面，以踏實之原則，挑選重點學科，俾學有所用。因此，修身、健身以及最起碼的國文和算術最重要，娛樂消遣性的科目得機動調整，必要時可以暫時減少。

經費不足，又須推動學務，教育行政機構的設立，雖然刻不容緩，做來亦甚不易。不過，在重重困境之中，政府當局仍有所展佈。民國四年秋，各省的教育廳終於籌議設立。其經費各省略有不同，「臨時費」變化較大，「經常費」則大致分作三個等級。茲概述如下：^③

1. 臨時費。至多不得逾三千元。

2. 經常費。全國的省份分三等：第一等每年三萬元；第二等每年二萬四千元；第三等每年一萬九千二百元。

廣西是個偏僻省份，被列為三等，與雲、貴、陝、甘以及新疆、吉林、黑龍江等省相同，每年約有二萬二千二百元。

兩年之後（民國六年九月六日），教育廳暫行條例公佈。七日大總統任命各省教育廳長，廣西省教育廳長由吳鼎新擔任。^④首任廳長甫上任，各種問題接踵而來。經費以外，就是人才的缺乏。十月六日，教育部咨廣西省長，指出廣西應行改進事宜，其中有兩點最重要，均涉及師資的養成，認為廣西的老師不夠水準：^⑤

1. 省立師範學校程度甚淺，且無附屬小學，無法實習，不足培植適宜之師資。

2. 蒼梧女子師範學校以警察學校畢業生為教師，難以勝任。

^② 政府公報，民國3年2月21日，號643，頁510-511。

^③ 教育雜誌，7:8，民國4年8月15日，頁69。

^④ 同上，9:10，民國6年10月20日，頁70。

^⑤ 同上，9:11，民國6年11月20日，頁80-81。

第一個問題牽涉到小學老師的培訓，第二個為師範教師的培訓，都是十分基本而且影響很廣的問題。前者不但涉及師範學校的教學，也涉及其實習的品質；後者更具體指出教學品質低落的原因，就在師範學校的老師竟然祇是警察學校的畢業生。這兩大問題的解決，主要依賴人才及經費。首先是人才的問題，沒有足夠的人才，無法教出優秀的師資；沒有優秀的師資，即無法培育新一代的優秀人才。而人才的養成亦需相當經費。這兩個問題，彼此環環相扣。而每個問題之內，又有難以數計的問題。由於帝國時期學政所扮演的角色，不若民主國家的教育廳長，因此民國初創，一切都在筭路藍縷之中。連廳長的職權為何，都要等待六年才得定案。⁸⁶民初百廢待舉，於此可見一斑。

在緩進的過程中，廣西在民初的十多年裏，仍有若干成就。例如中學教育，到了1922年左右，已有中學生 3,938 人。⁸⁷從今天看來，一個有一千萬人口的省份，才有四千名中學生，實在非常之少。但如以從無到有的立場來想像，已屬十分可貴。假使再與他省比較，就更易了解廣西的進度。落後的廣西能較雲南（2,959）、河南（3,311）、安徽（2,208）為高，已經超越原有的水準。⁸⁸

小學生方面，到了民國十二年（1923），廣西有 185,233 名小學生。與其他省份比較，廣西仍高過雲南（181,611）、安徽（97,340）、福建（175,663），且與湖北（216,843）、江西（213,709）相差不遠，⁸⁹也算超越原有的水準了。這是就絕對數字而言。如果從人口比率來看，則更可觀。除了雲南（2.06）、陝西（2.31）、山西（7.20）以外，其餘省份均不如廣西。⁹⁰廣西省受教育兒童佔學齡兒童總數的百分比雖然僅是區區的 1.70%，竟然高踞全國第九名。

職業教育方面，廣西的表現較差。在民國十五年時，為全國倒數第六名，祇成立了十五所職業學校，僅較青海（2 所）、察哈爾（4 所）、貴州（8 所）、綏遠（10 所）、甘肅（10 所）為佳，離第一名的江蘇（332 所）、第二名的山西（151 所）以及山東（146 所）、河南（110 所）、湖南（108 所）、直隸（107 所）均甚遠。⁹¹也不能與鄰省雲南的五十所相比，顯見廣西辦理人才教育有一個重大的缺點存在。因為職業教育需要專門人才，其相關學問十分具體，不是一般傳統儒生所能勝任。

⁸⁶ 教育廳長的職權，到民國 6 年才根據教育廳暫行條例訂定。見：教育雜誌，9:12，民國 6 年 12 月 20 日，頁 88。

⁸⁷ 教育雜誌，17:10，民國 14 年 10 月 20 日，「世界教育新潮」，頁 19。

⁸⁸ 同上。

⁸⁹ 司琦，同前，頁 136。

⁹⁰ 同上。

⁹¹ 「十四年度全國職業教育機關統計表」（15 年 5 月製），教育雜誌，19:3，民國 16 年 3 月 20 日。

在舉辦普通中學教育以及更基礎的小學教育方面，廣西可以用量取勝，短時間內培養較多的小學生與中學生，⁹²但是這些人都祇是通識教育下的產物，並無一技之長，對於廣西社會所急需的各項農、工、商、礦等建設，貢獻仍較間接。⁹³

留學教育方面，廣西的情況亦不甚佳。從民國十年到十四年，各省官費生的定額有相當大的差距。在這五年中，從各省官費出國留日與留歐美的人數、百分比與等第看來，廣西留學歐美的配額為3人，佔0.94%，居全國21名中的第18名；留學日本的配額有15人，佔1.39%，仍居全國第18名。⁹⁴

整個來說，廣西省有關人才培育的努力，在民初到北伐完成這一段時間已經有了初步的成果。估計到了民國十六年，廣西的識字人口應在二百萬以上，⁹⁵識字率也從過去的5~10%提高到20%以上。十六年內而有這樣的成績，雖然不能說突飛猛進，但已經算是相當豐碩的成果。當然這是就量方面而言。在質方面，顯著增加的這些文化人口，其程度能否比美中原諸省？則是另外一個問題了。

三、李、白、黃治下的廣西教育(1926-1937)

廣西省的教育，在進入李宗仁、白崇禧、黃旭初所謂廣西三傑以及早期的黃紹竑統治時期以後，有遠較清末、民初兩段更為輝煌的表現。李宗仁所領導的第七軍參與北伐，積極襄助完成統一中國的大業前後，廣西全省士氣大振。其後雖因編遣問題，導致中原大戰，俞作柏政變，及黃紹竑出走，但教育日受重視，似已成爲定局。而且學校教育的內容開始有相當大幅度的轉變，其中包括因訓政之義而施行的黨化教育、高等學府（如廣西大學）在桂成立、國民基礎教育的普及、軍事教育融入學校課程、以及社會教育、特種（民族）教育六大項。使廣西初期現代化的教育面，更增多種色彩。以下，先介紹當時教育環境的新氣象，再分就上述六點，逐項敘述。

新的環境之所以造成，與國家的統一有關。南京政府雖然仍有重重困難，但已能有效推展政令。這就是全國而言。就廣西而言，更是如此。

⁹² 山西省也有類似現象。其小學生就業率遙遙領先各省，但職業教育則祇能屈居第二，而且距離高居第一的江蘇省仍然十分遙遠。

⁹³ 廣西在李宗仁、黃紹竑治理下，於民國16年新創「稅務學校」與「銀行學校」，對於該省職業學校教育有若干突破。詳見：申報，民國16年3月3日。

⁹⁴ 根據：不著撰人，近代中國留學史，南京，民國15年；臺北，民國62年，頁225-226之統計。

⁹⁵ 以民國元年（約有4萬名）到16年（約有20萬名）每年平均培養10萬名小學生計算，再加上清末原有的識字人口50萬。

民國十五年開始，廣西因參與北伐屢建奇功，⁹⁵在政治上躍居相當重要的角色，教育經費也因而充實起來，而各級學校不論質與量均有顯著的提昇，例如廣西大學，亦就是這個時候的產物。⁹⁶民國十七年在廣西教育史上，是繼1902年西式教育開啓之後另一個重要年頭。

這一年也是國民政府自成立以來，第一次統領整個中國。國民政府深信教育為建設國家之本。後來更制成政策，於隔年公布：「中華民國之教育，根據三民主義，以充實人民生活，扶植社會生存，發展國民生計，延續民族生命為目的；務期民族獨立，民權普遍，民生發展，以促進世界於大同。」自此項宗旨公布之後，全國各地的教育設施才有所遵循。中小學教育方面，則於十七年即公布暫行條例，再次確定修業年限為六年。其後復針對課程、教學方法、訓育問題、體罰問題等，陸續頒布法規，使民初略具規模但各省不齊的狀態有所改善，進一步得以制度化與齊一化。中學方面，亦在民國十八年之後制訂課程及設備標準。十年之間，普通中學自 954 校增為 1,956 校，師範學校自 236 校增至 814 校，職業學校自 149 校增至 494 校。⁹⁷

在國民政府訓政的政策下，全國的教育均以三民主義為最高原則，三民主義的主要觀念，透過中國國民黨的一黨專政，貫徹到全部課程，使學生「整個的身心，融育於三民主義教育中。」⁹⁸倫理與科學兩項，成為黨化教育的指南針，俾「注重倫理及實踐以助長兒童忠孝、仁愛、信義、和平之德性」；「注重自然科學之教授，以養成兒童愛好自然，利用自然，改造自然的興趣，及破除對於自然現象一切的迷信。」⁹⁹

學制方面，以民國十一年公布的「新學制」為基礎，逐漸演變成更為完整的體制：學前教育四足歲至六足歲以下；國民教育六年（初級四年，高級二年）；中等教育分初級三年、高級三年；高等教育，大學除醫學院五年之外，餘均四年。醫學生及師範生另加實習一年。¹⁰⁰

廣西在全國均注重教育改革的大環境之中，也以教育的普及為要旨，另外加上軍事面的強調。這兩項，可以說是李、白、黃教育政策的主要特色。教育行政組織

⁹⁵ 朱法源，「廣西與北伐」，現代中國軍事史評論，期 6，民國 80 年 4 月，頁 1-30。

⁹⁶ 神田正雄，廣西省綜覽，東京，海外社，昭和 14 年，頁 389。

⁹⁷ 第二次中國教育年鑑，民國 37 年，臺北，宗青出版社，民國 72 年景印，頁 1。

⁹⁸ 同上，頁 30。

⁹⁹ 同上。

¹⁰⁰ 同上，頁 10。

方面，廣西省於二十年通過教育廳組織條例，廳以下原設四科，該年八月根據「各級學校施行軍事訓練辦法」增設第五科，專司辦理全省軍事教育及童軍教育。二十一年三月縮為三科。二十二年七月改回四科，自此不再增科。^⑩

教育經費龐大是新桂系教育政策上的一大特色。財政素來入不敷出的廣西，自民國十七年起特別強調教育建設。十七年度的教育經費，除增加田賦三成、補助各縣立中學及各縣教育局的七十萬元不計外，由教育廳直接支出者總計二百四十萬元，佔全省收入百分之十。^⑪據報載，當時先進諸國的教育費比率，日本（1927~28）為8.22%，英國（1926~27）為7.00%，意大利（1926~27）為6.66%，法國（1927）為5.49%，而中國（1927~28）為1.70%。^⑫廣西省此時提出10%為教育費，其用意十分清楚。廣西的教育經費，在民國十七年度即已提高到10%以上。到民國二十四年，其費用甚至更高（3,281,245元），在全國各省之中，僅次於江蘇（4,350,000元）、河北（3,848,450元）、廣東（3,702,346元）三省。^⑬

廣西以龐大教育經費，目的要從事教育行政、經費支用方法、高等教育、中等教育、初等教育、社會教育、科學教育以及特殊教育八大方面的突破或革新。在教育行政方面，以實施三民主義教育、軍事教育為最著；經費支用方面，提倡教育經費獨立；高等教育方面，以完成廣西大學、廣西師範專校之創設為著；中等教育方面，普遍實施軍事教育；初等教育方面，以勵行義務教育為重點；社會教育方面，在增設圖書館、體育場、閱報所、演講所；科學教育方面，創設博物館；特殊教育方面則以舉辦苗族教育為主。爰就其要者，分別敘述於後。

(一)中等教育最受重視，但其課程深染國民黨意識形態。

課程的變動最值得一提。為適應我國當時需要，需另行訂定。十八年八月頒行中學課程暫行標準，將初中及高中「公民」課改為「黨義」，初中增設黨童軍、高中增設軍事訓練。並且採取學分制，其中黨義均為六學分，黨童軍不計學分，軍事訓練計六學分，均為必修。初中必修180學分，高中必修150學分。^⑭

廣西省原則上依此標準，但有所調整。例如民國十七年所訂「初中科目學分暫行標準」，在應修的180學分中，必修的有143學分，包含「黨政訓練」10學分，實

^⑩ 但仍有多次調整，如舉行合署辦公，增加編審室、秘書室等，顯見制度的確立並不容易。

^⑪ 上海民國日報，民國17年8月25日。據日本駐粵總領事報告：「廣西省事情」（昭和6年11月，日本外務省檔案：支那國內事情關係雜件），其全部經費高達325萬元。

^⑫ Life, 4:30，轉載於教育雜誌，21:6，民國18年6月20日，頁69。

^⑬ 申報，民國25年11月19日。

^⑭ 黃健聲，抗戰前中國中等教育之研究，臺北，文史哲，民國71年，頁78-81。

授10小時，「軍事訓練」（女生改授體操）6學分，實授12小時，「公民」4學分，實授4小時。其中黨政訓練包含黨義訓練及政治訓練，公民科包含道德、經濟兩部分。這三科合稱「國民訓練」，總共20學分。除了國民訓練之外，廣西的初中還教授國語（35學分）、數學（28學分）、自然（19學分）、農科（12學分）、社會（16學分）、藝術（6學分）、體育衛生（7學分）。^⑩這些課程裏，如國語、地理、歷史三科合計51學分。這三科的內容應與黨的意識形態有關。以這三科與國民訓練的三科相加，則黨義闡揚所佔的學分幾乎高達71學分，佔所有必修學分的半數！而實授的鐘點更不止，國民訓練實授26小時，國語38小時，社會16小時，三者相加為80小時，已超過必修課實授鐘點數（156小時）的半數。當然，國府頒訂課程暫行標準的時間在此之後，廣西省或許會因而修改。不過，教授黨義的學分及時數是否因此而減少，則頗值懷疑。

迨民國二十年省政復歸統一，「一切教育設施，以實事求是，適應革命之需要為出發點。」^⑪以下幾項條例的通過，似為強化黨義教學而非弱化的明證：二十一年四月，西南執行部常務會議通過：西南各省各級學校的「訓育人員黨義教師檢定條例」、「訓育人員黨義教師考核保障獎勵辦法」、「訓育人員黨義教師檢定委員會組織通則」，以及「代用訓育人員代用黨義教師審查規程」，^⑫可見不只不考慮縮小，反而擴大招考相關的教員及行政人員。黨化教育在民國十八年以後，顯然更受到重視。

此外，當年教育的重點似在普及。但為培育更多小學生，中等教育就須加強，以充實師資。中學教育比起小學教育來說，重要性似乎更高，雖然中學教育較之小學教育更難立竿見影。但廣西省對提升中學教育的意願十分之高，自民國二十年至三十年，中等教育平均佔省教育經費的40%到50%。^⑬因此到了抗戰初期，全省中等學校的數量，計有：省立完全中學1所、省立初中20所、省立高中2所、省立師範3所、縣立初中21所、國民中學38所以及私立中學7所。^⑭與民國十一年39校

^⑩ 參見朱法源，中國現代化的區域研究：廣西的初期現代化，1860-1937，臺北，中研院近史所專刊稿，表五／四。

^⑪ 「教育施政綱領」（民國20年），李彥福等編，廣西教育史料，頁285。

^⑫ 多賀秋五郎，近代中國教育史資料，民國編（下），頁395-397。

^⑬ 李彥福等編，同前，頁322。

^⑭ 廣西省政府教育廳編印，廣西中等教育述要，民國28年2月，頁13-14。此份資料是否正確仍待查考。據雷沛鴻稱（「廣西中等教育的現在及將來」（民國22年12月4日），雷沛鴻文集，上册，頁188）早在民國22年廣西已有中等學校110所，其中包括完全中學1所，高中4所，初中65所，專科師範1所，師範講習29所，小學教員養成7所，職業學校3所。但因係官方資料，應不致少報，姑暫用之。

相比，十七年內已成長 236%，但若單就數量而言，與以下第三項即將敘述的國民基礎教育相比，差異仍極明顯。

(二)高等教育從無到有

廣西大學是廣西的第一所正規大學。於十六年開始籌備，以黃紹竑、馬君武、黃華表、鄧植儀、岑德彰等十一人為委員，^⑩陳柱尊、雷沛鴻、盤珠祁、劉寶琛為駐外特派員，設農、工、及理科三學院，於十七年暑假開辦，先招預科三百餘名。^⑪農學院設農學與林學兩系；工學院分機械工程、土木工程、採礦冶金三系；理學院設博學（物）、數理化學兩系。宗旨訂為「以適用於實用科學為其基礎，養成本省建設事業各項必須人才」。^⑫從這裏，可以看出廣西省當局務實以及建設地方的決心。可惜政局動盪，廣西大學創校開始，即深受影響，歷經許多波折。^⑬

西大於十七年十月十日正式開學，由馬君武任校長，盤珠祁為副校長，馬名海（兼教務長）、蔣繼伊、白鵬飛（兼事務長）、龍伯純等13人為教授，助教9人。民國十八年春，助教增至15人。民國二十六年時，教員人數已增至94人。其中留學生有46人：得博士學位者10人，得碩士學位者16人，得工程師文憑者2人，學士學位者5人。其他的48人均係大學或專科學校畢業。職員人數194人，曾留學外國者7人。其中得博士學位者3人，碩士者1人，學士者1人。^⑭九年之內有此成就，雖不能曰恢宏，也算頗有進步。

十八年三月寧鄂戰事起，四月粵桂亦捲入，六月粵軍入梧州，西大遂告停頓。兩年後粵軍退出梧州，馬君武奉命，於二十年九月十五日復校。有理學院一年級一班、預科三年級兩班、二年級兩班、一年級六班，共588人。二十一年六月預科第一班畢業，凡104人。九月，理學院分為數理、化學、生物三系，並成立農、工兩學院。農學院設農、林兩系，工學院設土木工程系，以馬校長兼工學院院長，盤珠祁兼農學院院長，馬名海兼理學院院長，馬校長並曾親赴德國購置儀器。^⑮西大自

^⑩ 馬君武，「校史」，廣西大學民24級畢業紀念刊，1935，頁1。

^⑪ 第一次招生人數，據崔兆麟，「國立廣西大學校史校歌」（廣西文獻，34，頁53）稱，為300餘人；據宗炎：「廣西第一所正規大學」（廣西地方志通訊，1，1983，頁90）稱，為280餘人。

^⑫ 上海民國日報，民國17年8月28日。

^⑬ 西大前幾任校長：

馬君武：民國17-25年

黃旭初：民國25-27年

白鵬飛：民國27-28年

馬君武：民國28-29年（改為國立）

雷沛鴻：民國29-30年。

^⑭ 廣西大學一覽，民國27年1月，「廣西大學廿六年度上學期教職員學歷統計圖」。

^⑮ 馬君武，「校史」，同上。

此逐漸步上軌道。

西大原創於梧州，到了民國二十五年，因省府命令改組，以省主席黃旭初兼校長。因職務之故，將校本部設在桂林，另設文法學院，與本部同在良豐的西林公園。同時併理、工院為理工學院，仍設梧州。農學院則遷至柳州沙塘。醫學院設於南寧。^⑩西大分為四部。二十六年春黃辭兼校長，以白鵬飛繼任。及抗戰軍興，日機轟炸梧州，理工學院乃遷至桂林。西大從四部併為三部。^⑪西大在省立時期，計預科畢業生 369 人，專科畢業生 152 人，本科畢業生 427 人。

由於馬君武為工學博士，西大的專長也在此。江亢虎說：「馬先生是研究工理的，因此廣西大學工理科辦得很好；他是德國留學生，所以校內所用的人才、設備、藥品，都有些德國的氣象。」^⑫西大另一個特色是佔地極廣。由於座落梧州市郊蝴蝶山上，原為荒山僻地，因此要依賴全校師生，「窮幹苦幹，半工半讀，幫助建築校舍，開闢馬路」。^⑬結果誠如江亢虎所言：「學校規模很大，風景也好；同時所有房屋，不在一處，一天都走不完。」當時的情境，講師王永華曾詠竹枝詞二首，以為寫照。茲照錄於此：^⑭

一片荒山落日斜，高低疏密影參差，
居然學府勞工地，男關藁萊女種花。
教室山顛百丈高，同嗟日日往來勞，
豈知腰腳偏成健，遠勝當年學體操。

學生何名忠對當年筚路藍縷情景，有更具體的記述：「學校開學以後，由於宿舍尚未完成，我們全體同學住在臨時之木屋。宿舍蓋在山頂，飯堂則設在山腳，從山頂走到山腳約十分鐘。由於當時道路尚未修築，落雨天道路泥濘，用餐時，常有滑倒翻滾。而最慘者，因宿舍為木屋，沒有瓦頂，下雨時，被服多被淋濕，備極艱辛。」^⑮

校舍不佳，並非草創時期的唯一特色。圖書儀器的充實更為要務。如康有為去

^⑩ 西大醫學院當時究竟如何，眾說紛紜：崔兆麟稱西大分為三部，其中並無南寧的醫學院。惟秦軍的「廣西大學的今昔」（《教育雜誌》，31:1，民國30年1月10日，頁20）指出黃旭初「增設文法學院和醫學院於邕寧」。而韜奮的「桂遊回憶」（三，抗戰，32，1937年12月29日，頁9）則謂文法學院在桂，醫學院在邕。茲從秦軍與韜奮。

^⑪ 崔兆麟，同上。

^⑫ 江亢虎口述，周煥紀錄，「西南四省及港澳越臺教育情形」，《教育雜誌》，25:1，民國24年1月20日，頁391。

^⑬ 秦軍，「廣西大學的今昔」，頁20。

^⑭ 同上，頁20-21。

^⑮ 何名忠，「廣西大學創校回憶」，《廣西文獻》，期6，頁40。

世後，家屬要變賣其藏書，馬氏聞訊立即派人前往，花了六千餘元買下來。西大的藏書至1940年時，達七萬六千餘冊。^⑭在儀器的添置方面，「至1932年止，僅購買理化儀器，就用去毫洋四十萬元。其中購買化學系的各種藥品、儀器，就有五百餘種，共三萬餘件。」^⑮1934年，馬氏赴歐，以重金從德國買回大小不同的白金坩堝和一個電解槽。「這個貴重的化學儀器，當時國內大學是少有的。」此外，馬氏還辦了工廠、林場、農場，以便學生實習。他成立植物研究所，聘請名植物學家陳煥鏞兼任所長，在廣西省內開展採集工作，有系統地研究廣西的植物。^⑯（該所是現在廣西植物研究所的前身。）由於他以及同仁的努力，西大一開始雖然遭逢許多困境，但仍欣欣向榮。俟1939年改為國立，馬氏又受命主持校務。「他回校那天，全校師生歡欣鼓舞，燃放鞭炮，猶如佳節。」

一所用以凝聚高級智慧及傳授高級知識的學府，在原本完全空白的地方建立起來，其間之困厄艱辛，非身臨其境者不能想見。但無論如何，廣西省教育的現代化，自此邁向一個更高的境界。當然，廣西的高等教育機構，並不僅廣西大學一所。^⑰而且桂省青年也不一定在省內接受高等教育。桂省青年在這段時期負笈他省者大有人在。特別是到廣州的國立中山大學。^⑱中山大學於1924至1937年間，曾有桂籍青年376人畢業。^⑲這些自省內外畢業的知識青年，對廣西現代化的各方面建設，自有其不可忽視的貢獻。^⑳

境界的提昇之外，廣西省政府更重視範圍的擴大，特別是受教育人數的增加。由於當時面臨國內各地軍系的互相傾軋，國外日本軍國主義的侵略以及德、義兩國法西斯主義的抬頭，還有正在中國逐漸形成氣候的共產主義社會平等主張的影響，廣西當局乃獨創一種兼容並包的新教育制度。這套制度，一來適合以軍領政的桂局，二來可以普及教育，達到社會平等，三來可以組織全省民衆，參與地方治安之維護、省政建設之執行等工作，四來更能訓練民衆軍事技能、戰鬥技巧，五來又剛

^⑭ 廣東的中山大學為華南各大學之翹楚，屬國立大學，經費較多，學院有六個，於1934年時，有藏書二十七萬冊。該校比西大早三年成立。詳見：黃福慶，近代中國高等教育研究：國立中山大學，1924-1937，臺北，中研院近史所，民國77年，頁155-156。

^⑮ 曾誠，「馬君武」，廣西教育，1981年第8期（總116期），頁14。

^⑯ 同上，頁14-15。

^⑰ 廣西的高等教育機構尚包括民國二十三年於南寧創設的省立醫學院；二十一年設於桂林的省立師專。省立師專於民國二十五年併入廣西大學，成為文法學院。另有法政專校，1908年開辦，1933年結束。工程專校，1921-1929。

^⑱ 潘宗武（鍾山縣人）即其一例。詳見黃嘉謨、朱法源：潘宗武先生訪問紀錄（稿）。

^⑲ 黃福慶，國立中山大學，頁165。

^⑳ 梁學基（容縣人）亦曾就讀於中山大學政治系，雖未及畢業即返桂服務，亦對廣西省政有相當貢獻。詳見：朱法源，梁學基先生訪問紀錄（稿）。

好配合訓政體制下，以三民主義為旨的黨治政策。由於恰逢其時，一套名為「國民基礎教育」的制度，從1933年開始流行起來。

(三)普及教育的重點在小學

小學教育的重點在普及，這個政策在 1931 年李任仁擔任廳長時已經訂定。^⑭廣西省國民基礎教育制度，顯然是由鄒平的「鄉農學校」、燕子磯的曉莊師範以及定縣、徐公橋、鎮平等實驗區的制度演變而來。所差異者，不過是範圍更大，行政機構更統一與強化。^⑮可以說是根據軍政統一的最高原則，強制執行軍事化、大眾化、生產化的義務教育和民衆教育合流的一種文化改造運動。據該套制度的創始者雷沛鴻（賓南）說：「國民基礎教育是一種有意識的民族行爲。」他又說：「國民基礎教育是中華民族對於現代，對於現在環境，不斷地努力，而做出的調整行爲。正是因爲它是一種行爲，而且是一種民族行爲，所以我們更須進一步了解國民基礎教育，它不但是一種『事業』，而且是一種『運動』。」^⑯簡單地說，其目標是要實現廣西的「三自政策」，並完成政治、經濟、文化和社會「四大建設」，^⑰以復興中華民族。因此，表面上它祇是廣西省教育方面的現代化運動之一，事實上則與當年該省政治、經濟、社會、文化各面均密切互動。

民國二十二年九月開始，廣西各級學校在廳長雷沛鴻領導下，制訂了一個普及國民基礎教育五年計畫大綱，要使省內所有的學齡兒童，都受義務教育；成年男女，都受民衆教育，氣魄十分之大。^⑱國基教育的著手處，可以分爲兩方面：在義務教育方面，使五足歲到十二足歲的兒童，受兩年的義務教育；十二足歲到十六歲的失學少年，受一年的補習教育。在民衆教育方面，失學成人須受半年（後來改爲四個月）的成人教育。^⑲學校的組織，分爲兩級：一是村（街）的「國民基礎學校」；一是鄉（鎮）的「中心國民基礎學校」。前者以一村（街）一校爲原則，後者以每鄉（鎮）設立一校爲原則。

國民基礎學校是實施國民基礎教育的中心機關。但它的功能遠大於此。它還是

^⑭ 李彥福等編，廣西教育史料，頁 285：「教育施政綱領」（民國20年）第二條。

^⑮ 林仲達，「民族解放戰爭與新興廣西國民基礎教育制度」，教育雜誌，29:2，轉載於司琦，中國國民教育發展史，頁 388。

^⑯ 雷賓南，「三年間廣西國民基礎教育運動的回顧與前瞻」，教育雜誌，26:9，民國25年9月10日，頁 2。

^⑰ 朱法源，「一九三〇年代廣西的動員與重建」，中研院近史所集刊，17（下），民國77年12月，頁 347。該文經轉載於廣西文獻，期46，民國78年10月，頁 9。

^⑱ 雷沛鴻，第一次教育學術討論會「開會詞」（民國22年11月12日），韋善美、馬濟和主編，雷沛鴻文集，南寧，廣西教育出版社，1989，上册，頁91。

^⑲ 楊衛玉，「廣西教育之觀感」，教育雜誌，28:12，民國27年12月10日，頁 8。

民團訓練、農村組織、地方自治和農村合作運動的發動機關，因此這種學校與普通小學不同。「普通小學校的對象，僅限於兒童；而國民基礎學校的對象，則包括兒童和成人。」^⑭甚至成人的重要性更高，因為接受失學補習教育的人，年齡從18歲到45歲都是社會的中堅。^⑮國基學校因而成爲改造社會的中心機關，特別注重民團訓練。當時成人教育的重點，在愛國教育與公民教育，即「不重在掃除文盲，而重在掃除政盲」。^⑯其收效頗宏；抗戰軍興後，桂省壯丁服役者高達一百二十餘萬人，爲全國之冠，而桂地兩次淪陷，民衆抗敵極熱烈勇敢，「此固由本省民族性之强悍，然未始非推行成人教育之功。」^⑰

由於國基教育非常重要，所需經費亦急劇提高。在籌劃此項計畫之時，國民教育經費爲1,310,660元（民國22年度），俟開始辦理，即提高爲3,205,695元（23年度），4,013,430元（24年度）。^⑱其學校數，從二十年的12,597所六年內增加到24,276所。受教育的兒童，從民國十二年的185,233人，到民國二十年的躍增爲549,055人，再到二十六年的1,665,092人。^⑲在十四年的時間內，成長900%。其中，前面的八年成長近三倍，後面的六年成長超過三倍，而時間更短。與全國各省相比，就量的觀點而言，廣西省的猛進，非他省所能匹敵。

但量多不代表質也提昇，相反的，廣西教育的品質，從學科的觀點來看，明顯是較爲不足的。秦鳳翔早於民國二十二年國基教育基礎大綱制後兩個月，也就是廣西省「第一次教育學術討論會」開會的第一天，即指出國基計畫在師資方面的缺憾。他說：^⑳

按師資爲普及國民基礎教育之重要原素。就量而言，當問其是否足用，不足如何補充。就質而言，當問其是否適宜，不適如何改良。

原案對於學齡兒童、失學青年及成人數，均未列統計，究需教師若干，其詳無從懸揣。唯就通常情形推之，可斷言其現在教師數之少，不足普及時所需人數十分之一二，而此少數教師中，不合格及程度太差者又近半數。不足與

^⑭ 黃旭初，「縣政建設與基層建設」，桂林，建設書店，民國30年，頁444-445。

^⑮ 韜奮，「桂遊回憶：（十七）基礎學校與中心學校」，抗戰，47，1938年2月19日，頁10。

^⑯ 訓練之科目，參見朱法源，「一九三〇年代廣西的動員與重建」，頁322-323。該文經轉載於廣西文獻，期45，民國78年7月，頁5。

^⑰ 光復大陸設計委員會編印，廣西省重建方案，臺北，民國59年，頁259。

^⑱ 申報，民國25年12月30日。

^⑲ 多賀秋五郎，同前，民國編（下），頁1235-7。陳超奇在「雷院長與少數民族教育」（廣西文史資料選輯，輯26，頁157）提到，就全省的兒童教育而言，雷接任廳長（1933）後的隔一年，其就學率增62%，隔二年又較諸前一年增74%。

^⑳ 秦鳳翔，「讀桂省國民基礎教育計畫大綱」（三），申報，民國22年11月13日。

不良之苦，兩者皆甚。

雷沛鴻亦承認，廣西省的國基教育必然涉及中等教育以及學術研究的風氣，這兩項在當年的廣西仍有嚴重缺陷。^⑭但在敵國日本即將展開全面侵略的前夕，視愛國教育為核心，普及民衆教育為手段，以求民族自救的猛進方式，雖得不足與不良之苦，亦可謂不得不然。^⑮

四軍事教育貫穿初中以上各種教育。

事實上，廣西大力興辦國民基礎教育，除了目的是社會性的（建設廣西各方面）以外，不但動機是政治性的，方法是政治性的，而且手段也是政治性的。Diana Lary 指出：當局希望藉重軍隊的力量，透過國基學校，組成龐大民團，動員全省的壯年與青年。^⑯由於藉重軍隊，而且正值內憂外患交侵，國際軍國主義、法西斯主義蔓延成風的時節，再加上國民黨以黨治國強調意識形態與黨治，使得具有濃厚價值判斷在內的軍事訓練，變成當時教育的核心。而軍人與警察也因此搖身一變，成為教師，加入原即不足且不良的教育的陣容中。如此一來，「一舉兩得」，教師大量缺乏的問題迎刃而解，而軍事教育（及政治教育）也得順利推展。

普通及職業學校軍事教育的實施，並不單限於廣西。民國十八年開始，教育部為便利進行全國高中以上學校軍事教育起見，曾與訓練總監部商定辦法，於該年五月通令各省教育廳及試行大學區制之大學，規定：軍事教官擔任授課之時數，在大學以每週十二小時至十六小時為限；在高中及專科學校以每週十八小時至二十小時為限。且軍事教官制於該年八月學期始業時起，一律實行。先由各地最高教育行政機關明白宣布，並切實調查。凡已經實施之各校，應令其將已實施情形呈報，如尚未實施，所需軍事教官幾人，應詳盡計畫，核實支配。^⑰學校軍事化是當年面臨強敵的中國政府決意大力推行的一個政策。

廣西推行軍事教育的熱度，甚至超過中央。中央規定高中以上才行軍訓，初中祇能有黨童軍。廣西並未照辦。廣西施行軍訓，自初中即已開始。可見其斯巴達化的意願，比國府中央為高。前述廣西初中的課程表，不但充滿意識形態，而且也排有軍事訓練課程。反之，黨童軍的課程並未之見。廣西如此，仿效的是法西斯主義的起源地意大利與德國。白崇禧曾強調：「意國之所以能夠像今天的強盛，全是

^⑭ 雷沛鴻，「開會詞」（民國22年11月12日），雷沛鴻文集，上册，頁92。

^⑮ 雷沛鴻，「民族自救運動下之民衆教育析論」（民國21年1月），雷沛鴻文集，上册，頁35-55。

^⑯ Diana Lary, *Region and Nation: The Kwangsi Clique in Chinese Politics, 1925-1937*, London,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, 1974, p. 170.

^⑰ 「軍事教育實施辦法之通令」，教育雜誌，21:5，民國18年5月20日，頁135。

由於慕沙里尼所組織之法西斯蒂黨的組織嚴密，同時全國尤其是學生都能軍隊化所致。」¹⁴⁸而走向法西斯，在當時而言，是必要的，也是最好的選擇，¹⁴⁹一方面用以抗敵，二方面更因德、意兩國於短時間內成爲世界軍事大國，而爲世界各國所仿襲。

(五)社會教育假國基教育以行

以較多的人力與經費從事強迫性的普及教育，也要在國民政府統一全國之後，才在各省普遍推展起來。廣西省的社會教育，與國民基礎學校是密切配合的，同時又透過民團的組訓來完成。在民團後備隊訓練時，注重民衆的識字訓練及公民訓練。民團後備隊有多少隊員，社會教育的對象就有多少。此外，早期即設有民衆學校，至二十年度時，校數爲 600，其中公立 518 校，私立 82 校，教職員 1,248 人，學生有三萬五千多人。¹⁵⁰二十四年度有 615 校，學生 21,415 人。另有補習學校，數量較民衆學校爲少：二十四年度有 23 校，學生 4,362 人。¹⁵¹在這個年度其他的社教機關，如民衆閱報處，有 348 個；民衆識字處，有 64 個；民衆問字及代筆處，有 490 個；公共娛樂場，有 2 場；民衆茶園，有 6 所。¹⁵²均是這一段時間，由政府有關當局所主動提供，希望以各種可能的途徑，掌握各種可能的機會，來提高成年人民識字的能力。廣西省在這方面所下的功夫，可以說全國第一。

其社教經費，更與江蘇省（742,462元）相差無幾，而到達731,770元。因此，從社教經費在省教育經費中所佔的比率看來，廣西的 22.30% 竟是全國各省市之冠，高於居第二名江蘇的 17.07%，第三名天津的 14.00%，湖北的 13.81%，以及第五名浙江的 12.55% 之上甚遠。¹⁵³桂省當局重視社教的程度由此可見。

(六)特種教育從禁根做起

國民政府建立以來，即十分留心少數民族的問題。¹⁵⁴胡志明等曾在國民黨第二

¹⁴⁸ 白崇禧，「從德意兩國的自強說到學校軍訓和體育」，壹年來之廣西，南寧，民國日報社，民國22年元旦特刊，頁1。另請參見：朱法源，「一九三〇年代廣西的動員與重建」，頁317。該文經轉載於廣西文獻，頁44，78年4月，頁70。

¹⁴⁹ 桂人當年積極學習法西斯，曾禮聘墨索里尼私人顧問 Dr. P. Ginseppe Copra 來廣西省政府訪問演講。詳見 Copra：「慕沙里尼統制下法西斯蒂化的意大利」，佚名編，「蒞桂中外名人演講錄」，桂林，西南印書局，1935，頁184-189。至於當年全國亦仿襲法西斯以強國，請見張俠著作：Maria Hsia Chang, *The Chinese Blue Shirt Society: Fascism and Developmental Nationalism*, Berkeley,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, 1985, pp. 125-126

¹⁵⁰ 第一次中國教育年鑑，頁617。

¹⁵¹ 申報，民國24年2月19日。

¹⁵² 申報，民國24年2月26日。

¹⁵³ 申報，民國25年11月19日。

¹⁵⁴ 自民國九年起，孫中山即提出「中華民族」說。詳見，朱法源，「孫中山民族主義的轉折與困惑」，滿族文化，期15，民國80年6月，頁7-8。

次全國代表大會中呼籲重視各個民族。^⑭廣西省的領導人亦曾加以注意，但未十分重視。^⑮在廣西談普及教育，與沿江沿海的省份不同的，是特別要注意少數民族。少數民族在廣西並非少數，在秦漢時代，則整個廣西是他們的天下。雖然演變到了一九三〇年代，而其人口也降為全省人口的三分之一。其中居多數的壯人以及其他各族，已因與漢族相混雜而互相同化，但是仍有許多壯人、侏人、苗人固守偏遠地帶，與漢人極少接觸。與漢人接觸多的地區，彼此文化交流頻仍，族人的文化水準較高；與漢人少接觸者，文化難免落後。對於這些人，廣西當局在前清時期，即曾有「孺學」之設，政府以公費提供當地土著進修的機會，不過人數實在太少。到了嘉慶年間，全省七百萬多萬的人口中可能有三百萬以上為土著，但官學中侏學的名額只有6個，而且只提供給漢化程度高的桂林府（2名）與柳州府（4名）。^⑯其他「偏遠」的各府，雖然住有許多土著，則完全沒有官費。

這種嚴重歧視與偏頗的狀態，主要肇因於交通不便，但當局亦難完全辭其咎。民國初造的十餘年，社會動盪加上主政者尚未注意及之，情況仍未好轉。到了1933年才有政策性的轉變。民國二十二年度「地方教育實施準則」「社會教育」類第九條規定，各縣如接近苗族居住區域，應即詳細調查，並依照苗族教育實施方案，齊辦苗族教育。另外還規定：須於該年內完成二分之一，其餘復成立苗侏教育委員會，專司籌劃。^⑰

二十二年夏，廣西省頒佈特種教育實施方案，次年春成立特種教育委員會，策劃全省特種教育進行事宜。主張：開化土族，須從培養師資做起，收效最鉅。由於當年並無「壯族」稱呼，^⑱省民咸以苗侏呼之，因此提倡「以侏化侏」，開辦特種師資訓練所，由各縣選送特種子弟，於二十四年一月開學。其階級為中等學校，直屬省府。^⑲據省府統計，當時省內特種部族總數凡三十餘萬，分布六十餘縣，且散居深山窮谷。^⑳為貫徹社會教育的宗旨，分別在六十一縣的特種部族住區，設立各級國民基礎學校，至民國二十八年底已達598所。同時在東蘭、鳳山、天峩三縣，

^⑭ 參見：朱法源，「孫中山與胡志明民族主義的比較」，廣東，翠亨，孫中山與亞洲國際學術討論會論文，1990，頁16。

^⑮ 民國十七年度廣西省教育經費有3,204,133元，其中苗侏教育經費為10,000元。

^⑯ 嘉慶朝重修大清一統志—廣西之部。

^⑰ 賀縣志（民國23年），卷6，頁24。

^⑱ 「壯族」之出現，是在中共據有大陸之後。1952年中共在廣西成立自治區，並採用「壯族」一詞。

^⑲ 馬毅，「苗民教育之檢討與建議」，西南邊疆，期7，昆明，該社，民國29年1月，新編冊2，頁605。該校先設在南寧，不久隨省府遷至桂林。為廣西省第一所少數民族師範學校。詳見：陳超奇，「雷院長與少數民族教育」，廣西文史資料選輯，輯26，頁158。

^⑳ 此三十餘萬，自以交通極度不便地區為主。其餘大多數少數民族均已與漢族雜居，沒有計算在內。

設立聯立國民中學，附設特種師資訓練班。爲求更加普遍，劃定了特種教育區域，並訂定特種教育區域設校補助金辦法。自二十四年度起，每年由省款予以補助。由於「進行頗爲積極，辦法亦甚切實，雖實施不久，而成績甚善。」^⑫

例如平南縣共有侏村29處，即設有侏鄉中心學校與基礎學校。中心學校方面，在羅香、平竹、羅運、那平四鄉各設一所，高初級各一班，高級學生84名，初級76名。^⑬校舍原借用關岳廟、列聖宮，或民房。由於空間狹小且空氣光線均不適宜，省府曾飭另建，並補助每校建築費100元，派員前往協同計畫，而於二十八年度完成。基礎學校方面，有21所，學生455名。其中已建築新校舍者有4所，其餘均借用民房，亦於二十八年前後籌款新建。^⑭

由於侏民等少數民族散居深山叢林，特種教育的推展並不容易。例如全縣，該縣泗溪源等處侏民有數百戶，學齡兒童亦不過一、二百人。然以散居各山，距離頗遠。所謂「山峯佬之對門，各在一山，雖對面能相互說話，而走時非半日不能達到。」^⑮要選擇一個適當位置，使居住羣山之中的兒童均方便到達，除了距離的困難以外，還有無徑可行之苦。爲此省政府設立了一個「興（安）全（縣）灌（陽）」聯區委員會，積極進行剪荆棘、啓山林，驅其狐狸豺狼，爲之編戶口等工作，以爲設立學校的基礎。^⑯

從這兩個例子，即可看見特種教育的推展，並不只是單純的教育問題，它另外還涉及房舍的興建、道路的開闢、戶口的編訂等等，在在需要人力、財力與物資。此外，更需要全體侏民（及其他少數民族）的配合，願意改變原來遺世獨立的荒野生活，接受教化。前者多涉外在因素，後者則爲心態的改變，但缺一不可。

總觀北伐以後廣西培植人才的成果，可見普遍化，求量方面急劇提高，是當年努力的重點。以下小學及中學學生人數及學校校數的統計，證明當局的努力沒有白費。民國十七年大約七千所小學，四十所中學，到二十六年以最保守的估計，已增加爲兩萬四千所小學，九十所中學。在前後剛好十年的時間內，小學增加近三倍半，中學增爲兩倍。高等學府方面，亦成立了廣西大學、廣西師範專校等等。與民國元年的一千五百所小學，二十餘所中學相比，其進展不能說不顯著。而培育的學生，民初每年約六、七萬小學生，四千中學生，至二十六年增爲一百七十萬小學生

^⑫ 教育雜誌，29:7，民國28年7月10日，頁92。

^⑬ 馬毅，同前。

^⑭ 平南縣鑑（民國29年），教育，頁1。

^⑮ 全縣志（民國24年），社會，頁65。

^⑯ 同上，頁65-66。

與兩萬多中學生，使廣西省文盲的比率，從清末的90%以上，民國十六年的80%左右急劇下降。依粗略推算，民國二十六年的文盲比率，應已減至50%以下。在一千四百多萬的人口中，至少有一千五百人具有大學學士以上的程度，^{①⑥}一萬人具有高中程度，十萬人具有初中畢業程度，三百萬以上的人口具有小學六年以上的程度，有五百萬左右的人口，具有初小（四年級）以上的程度。曾經進過小學者或粗識之無，具有「功能識字能力」(functional literacy) 以上者，^{①⑦}應有七、八百萬人。^{①⑧}

結 論

從清末到抗戰開始，廣西與整個中國的命運，其關係之密切，僅次於廣東省。康有為的聖學會及廣仁報以桂林為重鎮；孫中山的武裝革命，廣西為重要據點，廣西人投入其行列者亦衆；即武昌起義，廣西新軍更長驅直上武漢，響應革命；護國運動若無陸榮廷的義旗，不足以倒袁；孫中山組政府，以兩廣為基地；蔣中正領導北伐，率先出兵的是第七軍。^{①⑨}在建國的黃金十年中，廣西被稱為三民主義的模範省；^{①⑩}廣西青年所主導的國基教育及新縣制，旋在全國普遍推行；^{①⑪}迨抗戰軍興，廣西青年踴躍奮起，從軍一百多萬人，為全國之冠。

這一系列足以傲視國人的成就，以及廣西之所以有本錢，先在陸榮廷等所謂「舊桂系」，後在李宗仁等所謂「新桂系」的領導下，統領兩廣一帶前後達二十餘年，若無一批批優秀青年為其股肱，決不可能如此。而這批青年之所以優秀，與廣西教育的初期現代化不無關係。廣西初期現代化的成就也由此可見：聖學會及廣仁報的盛況可謂空前，廣西上自巡撫下至一般士紳多有景然風從者；由於廣西青年學生及秘密會黨的投入，而有鎮南關之役、河口之役、欽、廉之役、廣州之役以及黃花崗之役；廣西舊派及新派士紳支持陸榮廷，乃能護國倒袁；廣西新式軍人積極加

^{①⑥} 至民國二十六年西大的本科畢業生有 427 人，中山大學桂籍畢業生有 376 人（黃福慶，民國 79 年，頁 165。）其餘省內、外以及國外的大學畢業生，若以 700 人計，則桂人在抗戰以前至少已有 1,500 人左右自大學畢業。

^{①⑦} 「功能識字能力」指「能計算數目，寫簡單的信函，不受人欺騙」。詳見：張朋園，「勞著『清代教育及大眾識字能力』」，頁 458。

^{①⑧} 對於高中（職校）畢業程度、初中畢業程度人數之估算，傾向保守。作者以民國十九年小學教職員有二萬三千人，推算七年後高校、初中畢業人數，小學畢業生，自 14 年至 26 年共有一百五十多萬人，故加一倍；小學四年程度，以小學生自 14 至 26 年的累計總人數的三分之一計算。至於粗識之無者，則以民國 26 年廣西全省小學生數 (2,581,431 人) 的三倍計算。以上資料根據：李彥福等編，廣西教育史料，頁 443-551。

^{①⑨} 朱汝源，「廣西與北伐」，現代中國軍事史評論，期 6，民國 79 年，頁 11-13。

^{①⑩} 朱汝源，「一九三〇年代廣西的動員與重建」，同前，頁 332。

^{①⑪} 雷沛鴻，「國民基礎教育普及運動與國民中學的創制」，廣西文史資料選輯，輯 26，頁 24。

入國民黨，而後才有國民政府的成立；第七軍的領導者均係國內軍校訓練而成的新軍人；由這批新軍人帶領，佐以留學歐美返國青年，設計了一系列的制度，如梁翰嵩的民團、雷沛鴻的國基教育、雷殷的新縣制，透過三自政策，有效地動員了全省人民，鼓舞了戰志，使廣西青年在抗戰期間成爲驍勇善戰的勇士。這一切在在顯示廣西當局，包括機關學校在內，較能配合時代脈動與國家需要來教育人民。

本文以清末、民初、以及李、白、黃時期三個段落介紹廣西教育的初期現代化，已粗略點明其在量方面的成就以及教育內涵的大致方向。從今天臺灣的教育普及率來看當年廣西的現代化，在人才培育方面的成績自然仍嫌不足；廣西的教育尙未到達今天臺灣現代化的標準，但是假使倒過來從清末作爲起點，來看抗戰軍興之前的廣西，則其培育人才之成就，已十分具體。識字人口較諸清末，已滋生二十倍左右。從量上看，年代廣西的教育成果，不論與廣西的過去相比，或者與其他的省份比，其成就仍舊可以被肯定。

從文化的啓蒙、識字率的提高、教育制度的改變、學校的增設、高等教育的創制，可以證明知識的普及，與辛亥革命的發生及民國肇建後一連串改革息息相關。也可以體會：辛亥革命並非空穴來風，亦非僅止於片面的政治性武裝革命。它的發動，在文化面的淵源實深。而清末新式教育的提倡，使人民視界大開，也使清吏、清軍了解大幅度變革的必要。因此投入革命者頗不乏人，使廣西成爲孫中山歷次武裝舉事的重要據點之一，廣西人更成爲革命的先鋒與尖兵。清末的新式教育，雖然只培育了二十萬左右的新式文化人，佔全省八百萬人口中的2.5個百分點，但已足以使人民知道如何來創造一個更好的政府，而於1911年成功地推翻清廷，肇建了中華民國。

但整體社會的改造，並非一朝一夕可爲功。教育的改良亦然。民初廣西教育推展的情況，比起清末更普及，但困難也更多，因爲政局不穩、經費不夠、人才也不足。然而，躓踣困厄之間，仍有明顯的進步。陸榮廷下臺時，廣西小學校中的學生數額，竟已高過文風頗盛的福建。識字人口也達到20%以上，至少有兩百萬人。

俟李宗仁等人上臺，重用於民國八年自哈佛大學取得碩士學位的雷沛鴻等人，自民十六年開始，廣西的教育結構、制度與內涵，以較大的幅度、廣度、與深度在進步著。^⑮在他們聯手統治之下，^⑯廣西省教育成長的速度十分驚人。十年之間所

^⑮ 雷榮甲、陳業強、金開山，「雷沛鴻」，雷沛鴻先生事略，南寧，私立西江業餘職業學校編印，1984，頁2-3。

^⑯ 俞作柏出任廣西省主席期間，亦以雷沛鴻任省府委員兼教育廳長。

培養的新式文化人，加上早期所培養的，已達七、八百萬，佔當年一千四百萬省民的五十個百分點以上。不過，由於強敵壓境，為求自衛而難免帶有濃厚的戰鬥色彩。文武合一，是抗戰以前廣西教育的特色，其中又參雜着意識形態。

以上所提，都是辛亥前後社會大改造過程中的必然現象。它使辛亥革命在中國歷史上，不代表一個句點，一個完結，而是舊中國在演變成爲新中國的漫長曲折道路上，一個關鍵性的轉捩點。^⑳這就是教育與時代大環境之間的關係而言。

惟若純就教育成效而言，廣西文風畢竟不若沿江、沿海地區。由於文盲普遍，廣西當局必須將教育的重點放在初等以及中等教育上。初等教育包含兒童教育與成人教育，也可以說包含學校教育與社會教育。在民國二十年代，其經費幾與中等教育相埒。這種現象，殊異於文風名列第一的江蘇省。依王樹槐研究，至民國十九年，江蘇的初等學校有 9,293 所，^㉑較諸廣西的 10,698 所仍有所不及。江蘇人口爲全國第三位，省方對初等教育不夠重視，由此可見。但江蘇重視高等教育，又與廣西不同。江蘇單在民國二十年一年即有大學生 4,873 人，在國內各大學（其中 21 所在江蘇）就讀。^㉒而廣西到了民國二十六年，才累積了一千五百名的大學畢業生，二者相差十分懸殊。

從這一個尖銳的對比來看，則民國初造的二十六年間，各省教育的成果，及所生對省民以及國家整體的影響，顯然有着巨大的差異存在。而廣西的偏重普及，偏愛數量，以及高度的軍事與意識形態取向，帶來尚武之風，有助於軍事抗爭，於對日抗戰貢獻極大。但軍事並非一切，以軍事掛帥的教育，較強調命令的貫徹與執行，所需人才不必具備高等的知識，因此也就比較忽視高級人才的培育。所以，即使以當年的教育水準來看，廣西教育的初期現代化縱令確實著有成效，也不過止於初級的階段，而且教育所涵蓋的面向，也仍然不夠週全。

^⑳ 從舊中國演變成爲政治民主、經濟富足、社會安定、文化多元的新中國所需的時間少則一百年，多則兩百年。詳見拙作：“The Evolutionary Nature of Revolution: France and China as Two Cases,” conference paper for the 33rd Annual Meeting of the American Association for Chinese Studies, draft, Nov. 1991, pp. 32-34

^㉑ 王樹槐，中國現代化的區域研究：江蘇省，1860-1916，臺北，中研院近史所，民國73年，頁258。

^㉒ 同上，頁 252-253。

地方精英與國家權力

——民國時期的宛西自治，1930~1943

沈 松 橋

摘 要

本文以一九三〇及四〇年代河南西南部內鄉、鎮平、淅川等縣，在少數地方精英支配與推動下，所展開的「宛西自治運動」為討論對象，企圖藉此釐清二十世紀中國政治發展過程中國家／社會關係的變化軌跡。

本文指出，自十九世紀中期以降，隨着社會軍事化的日益加深，河南地方精英的性質漸趨轉化，其所賴以掌握地方社會支配權力的資源基礎，亦由傳統的科舉功名，一變而為強制性的武裝力量。主導宛西自治的別廷芳、彭禹廷、陳舜德諸人便是於此一背景中，憑藉各類資源，運用不同策略，相率崛起；進而協議聯防，揭櫫「三自主義」，推動自治運動，而其諸項措施多有侵越政府職權者。在一九三〇年代，南京國民政府極力強化國家權威，貫徹統治權力的態勢下，宛西地方精英與國家權力之間遂不免於長期的衝突與對抗。直迄抗戰末期，宛西自治勢力始為國家力量所收編。另一方面，由於社會經濟條件的限制，宛西自治運動固有不容抹殺之重大成就，却始終無法突破民國時期地方政治過程中「土豪劣紳」專擅壟斷的基本模式，更不足以為現代中國國家／社會關係的調整，提供一條可行的路徑。